

第一章 人生的价值桃子

人生是一杯甜美的果浆还是苦水？

传说，潘多拉主张给苦水，正义女神忒弥斯偷偷给甜桃。

潘多拉让人与苦难签订合同，忒弥斯则向世界丢桃子，抛向西方的是自由的价值桃子，抛向东方的是公平的价值桃子。

这种传说，无疑是后人杜撰的，但却反映了人对人生的思考。

1—1 从人生理想境界的价值说起

人生在世究竟为了什么？为了寻求苦难？显然不是。在宙斯的大门外的两只罐子，装着幸福的罐子一边总是排着长队，盛着苦难的罐子总是无人自动问津。这是人之常情。然而，海尔布鲁诺却认为，逻辑往往是不会赢得人缘的，意思是说，人类求若所欲，总是缘木而求鱼。的确如此，自古以来，人们在世上活了一辈子，是很少不带着遗憾告别人世的。久而久之，人心也平了。认为，有缺憾也该算美好，美总是不完善的。初一的眉月，那柔美的曲线呈现一种令人期望的特殊美感；花落也是缺憾的美，但总比不受花落威胁的塑料花真实，它不虚伪，不粉饰，更具有自然美。当然，不能否定有其合理的内核，问题在于人们学着阿Q寻找理由，知足常乐。有人干脆认为，人类是福耳库斯的儿女，每人仅有一牙一眼，注定只能轮流享

用价值。

二百多年前，亚当·斯密讲了一个别针的故事。他说：

“把别针的生产过程分为十八道工序，相互竞争着劳动，结果创造了每天人均生产四千八百多枚别针的奇迹，比工业革命前，一个铁匠每天制作一枚别针的传统劳动，提高效率几千倍”。然而，在他看来，效率与和谐，是针尖对麦芒，不是君子与淑女。得到效率，失去和谐；得到和谐，失去效率。结论是，用人类自我感觉的尺度来衡量，两者都不完美。

按照中国的俗话来说，是甘蔗没有两头甜，一手难柯两条

自从人类发现自己在自然界的奇特位置之后，并没有就范于时代的悲剧性的历史后果。

在悠久的人类演化中，人们前赴后继，探索人生理想境界这一神圣课题，从未停止过，是堪称勇敢的。但是，结果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慨：“人生就是这样微妙，尽管各时代、各民族的主旋律各不相同，但就价值追求而言，万变不离其宗，实质上不过是两个梦的变奏而已：求生存、求富足；求平等、求和谐。将这两个梦同时变为现实，就是再理想不过的人生境界了。然而，得出的结论是，要求平等、和谐，必须以平等为前提，以仁爱为楔子，以无私为动力；要求个人富足，却要打破这种平等，以私欲为杠杆，削弱这种仁爱。认为逻辑似乎总与人道主义开玩笑，并不把人类的理想作为自己的目标。个人富足、群体和谐两种理想成了不能兼得的怪圈，掉入冥冥的黑洞。

有人认为至少到目前为止，人生的两种理想的价值桃子——富足与和谐，被置于翘翘板的两端，历史常常迫使人们在

作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

1—2 西方传统的价值追求

世界上并不存在纯之又纯的传统，无论是黄金人类或是黑铁世纪，全不例外。

但是，没有传统就失去历史的延续，历史是薪尽火传，辗转相传的。传统的价值追求，无论是东宾或西席皆有沿传。

西方传统的价值追求——重视个人竞争，与东方有着明显的差异。

追溯引起这种差异的源头，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对于源远流长的西方价值取向及其传统特色，作一番远距离的观察，是不无教益的。

西方价值体系与希腊、罗马和希伯来文化有深刻渊源，远古时代的犹太教曾对西方价值体系的形成起过重要作用，输送过原始基因。按犹太教的教义，主张主宰世界的是一个拥有至高无上权利的上帝，人是上帝的最后一个创造物。每个个人在上帝面前地位相同。他所说的人，是自我中心的个人，而不是群体——大写的人。古希；腊的先哲们也宣传重视个人的理想，并上升为伦理观念，认为人具有自我约束能力，比其他存在更高贵，人是自己的普罗米修斯，人创造了航海、农业、牧业、城市、语言、文化、风俗等。人是创造的中心。虽然，也提倡人人平等，但是平等是个人独立的根据，而不是群体的栅栏，这些伦理主张和宗教都是西方价值体系较早的源头，是重视个人原则和创造、竞争的早期雏形。然而，在中世纪前，这种雏形始终是雏形，圣经并不提供成长的雨露。

中世纪后，资产阶级接过了这个原则，用以反对封建贵族的特权。强调要以人为中心，从神的淫威中解放出来，为近代

西方重视个人与竞争，制造了柱子底下的石墩。法国大革命时期，许多启蒙运动的先驱者，运用理论的彩笔，论证个体在生理方面完全相同，都是二百零六块骨骼支一个架，都是十个月造一个生命，说明人类的父母并无偏心，以此作为思想的剑牌反对封建专制，倡天赋人权，从而形成了西方文化强调个人自由竞争的近代表现形式。当然，西方价值体系规定重视个人原则，实际上是有其局限性的。它局限于自由民、基督教、有产者或殖民者的社会生活范围，它反映了占统治地位的同一阶级个人之间的行为模式。但是，戴铁环并镶上高加索山石片的普罗密修斯及其替身喀戎，虽然享受不到宙斯与赫拉拥有的个人自由原则，它毕竟地道地反映了西方长期以来存在的占统治地位的价值体系的传统特征。

另外，西方价值取向，在思维方式上从古希腊时代起，就特别强调人可支配自然和对事物的分析，亚里士多德第一个把人定义为理性的生物；在普里塔戈拉的名言中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古希腊后期的哲学中，德漠克利特在原子论中表现了单个人的观念，他强调世界是可以划分的，强调组成世界的具体元素，这种思考方式就孕育重视整体中的局部和个体的征兆，他感兴趣的不是整个庙，而是对庙中个别菩萨的猎奇。这种搜异猎奇，使他们有纯数学的研究，纯粹天文学研究。这种自然相对于人的超越性的思维方式发展与继承，形成了以分析为主要内容的实证科学。从经典力学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类分科，主要是分解和剖析事物的具体组成部分，钟情于局部和个性的。随着资产阶级粉黛登场，西方商业日渐发达，围绕着价值的过剩与短缺，并逐而竞，对辨而争，成为经济生活的家常便饭，于是，又加深了

戴铁环并镶上高加索山石片的普罗密修斯及其替身喀戎，虽然享受不到宙斯与赫拉拥有的个人自由原则，它毕竟地道的反映了西方长期以来存在的占统治地位价值体系的传统特征。

— 作 者



它们在观念上重视个体竞争的烙印。

总之，西方重视个人竞争有悠久历史渊源，还有历史上经济发展的基础作为根据，这是西方民族传统价值取向长期积淀的结果，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伴和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个人在现实生产活动中的作用不断得到强调，竞争不断得到青睐，重视个人与竞争，就不可避免地成为西方占据统治地位的价值追求。

1—3 东方传统的价值追求

东方的文明，是婆娑绿影，色彩斑斓的。尽管驳杂不纯，但仍然是错落有致，脉络清晰。

东方传统的价值追求，与西方南辕北辙，重视的是群体的和谐。以日本为例，其价值体系与中国、印度密切相关。

早在绳文时代以前，日本民族信仰咒术，相信世界万物附有神灵，构成了群体的宗教原形。

公元一、二世纪后，中国儒学东渡日本，诸如仁的观念与伦理道德，天的思想和正统观念都相继在日本“落户”。隋唐之后，中国成了当时世界上现代化的领潮儿，日本垂涎欲滴，于是派留学生大规模学习中国，印度佛教也传到日本。这样，使日本的价值体系形成了具有明显东方色彩的传统。

日本重视群体、和谐，提倡个人对群体的归属，强调内部的序列与协调。首先，日本的宗教驱逐了上帝，让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蛇狼猿鹿等一切自然存在物都成了神灵，高贵的和卑贱的共同构成一个体系，这种信仰，使日本在古代就具有从整体上观察体系，重视群体、和谐的特征雏形。其二，日本古代的自然观也与西方（把人和自然截然分开）不同，主张天人相与（中国讲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结亲，构成一个总体系和

谐相处。直至封建末期，虽然，受到西风东进的诘难，但是，日本古代的思维模式依旧屹然峙立。著名学者横井小楠，仍然强调人是天中一小天，整体的大厦还是春风得势。

日本古代对于人的概念规定是抽象的，是大写的人，而不看成为单个人的个人。在思维方式上，也不象西方那样强调分解和剖析事物中的具体元素，而是心照神交，自悟自解。人和自然的关系也不存在西方主张的支配关系，认为，人不应支配自然，而应该认识自然、顺应自然和利用自然。这有合理的内核，但也包含着人的自我意识受到抑制的契机，自我与删略号为友，大胆的问号不受欢迎，富有同情心的感叹号红运高照，乐于追根寻源者很快会被授以句号。

另外，日本与西方重视横向关系不同，尤重合纵。认为，与神灵各有位置一样，人对自然万物也都自有位置，它就是群体中的个人按上下卑贱结成序列，各就各位，相安无事。认为这是促使体系稳定的保证，是保持群体和谐统一的不可动摇的原则。虽然，上下相安，仅仅是上层人永保高位的理想，下层人的福份是安分守己，然而，重视群体和谐毕竟成为日本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追求，也反映了东方价值取向一个重要规范和形态特征。当然，在日本国的价值体系中，大和民族还有自己的特立独行。主要是强化了三个观念：

一是群体圣化观念。日本统治者，借神道设教，以服天下，把日本民族的同一姓氏，同一血缘，或同一地域都祭仁同一尊氏神的氏神信仰加以圣化，氏神作为群体的守护神受到尊崇，它所代表的群体也具有崇高的权威，敷以神圣色彩，于是群体也得以圣化，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使人们为群体的天道献忠，为群体利益克制自身的观念得以强化。

二是群体内序列观念。他们从无数氏神并存，构成氏神体系的序列，引伸开来，作为氏神代理人的祭司者——群体首领，也就占有较高的金交椅，由此派生出群体内部序列关系，并给蒙上一层浓厚的父子兄弟式亲和面纱，使这种关系盖上社会印章，成为一种公认道德规范。

三是群体内个体交换协同观念。日本人称为缘结制度。实际上是对提供帮助者得到相应报偿的制度，是群体内个体互相关照关系所规定的基本信条，作为维持群体和谐的带扣。

上述三项行为观念相互交织渲染，构成了具有日本底色的东方型重视群体和谐的价值追求。

以上，我们分析了西方重视个人与竞争，东方重视群体与和谐的差异。它向我们展示这样一个现实：人类象熊瞎子摘桃子，摘一个，扔一个，却始终处在自以为是的盲目之中。难怪历史把人看作是唯一用不同数目的脚走路的生物，早晨用四只脚走路，当午两只脚走路，晚间三只脚走路，用两只脚走路才是成熟有生气的真正的人。摘一个，丢一个的盲目，是人类不成熟象征，是处在用四只脚走路的幼儿期。

1—4 中国的价值追求

中国是举世闻名的文明古国。中国的传统，水华究灵奥，阳精测神秘，富有神奇之气，传神之法。

在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曾有一个时期追求个人富足，提倡仓禀实，衣食足。后来渐渐地求群体和谐的理想开始升华，成为突出的特写，而求个人富足的旗帜开始降格，成为陪衬的背景。春秋战国时，曾经把智、仁、勇看成是三种基本价值。到后来，智从知识和力量换成是明辨处理相互关系是非的能力，求生存、富足的勇衰退了，求和谐的仁独占了鳌头。孔

古时候，人类象熊瞎子摘桃子，摘一个，扔一个，却始终处在自以为是的盲目之中。

——作 者



子的学说中心是讲仁，包括两大屏障，一讲人和人的关系，叫为仁由己和仁者爱人；二讲人和社会的关系，称克己复礼为仁。到了战国，主要分成两个分支：一是孟子从人和人的关系仁者爱人出发，发展孔子学说；二是荀子从人和社会的关系，以礼为中心发展孔子学说。到两汉，一是，使儒家伦理进一步完备化，在人和社会的关系上，出了一个新招，提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人和人的关系上，提出五常（仁义礼智信），用以维持封建和谐秩序，实际上是捆绑人性的绳索。二是，神秘化，提出三纲之大，皆出于天，意思是说，这不是肉胎凡人的创造，而是上帝的旨意。到了魏晋南北朝，儒家的礼危机，认为礼是一切坏事的根源，出现了魏晋玄学。玄就是虚无，主张以无为本，自然为性。然而，贤愚有别，尊卑有序，大家相安无事，听其自然，天下就可以和谐太平了。到隋唐，儒学又开始复兴，提出博爱就是仁，主张自满自足，对外无所求，足乎已无待于外，就可以避免竞争，以求和谐。到宋代，对儒学进行了一番改造，一是把天发展为天理，认为，忠、孝、仁、义是先天地而生的天理。有人认为没有客观的天理，只有主观的良心、吾心，这就是所谓的理学与心学之争，即程朱与陆王区别，但重视和谐是相同的；二是提倡诚是五常之根本，认为是符合封建社会和谐秩序的各种行为之渊源；三是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认为无人欲，天下就平安和谐了，反对个人欲望与功利追求，认为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对妇女更为苛刻，主张求生存、求富足是小事，失节才是大事。到明代，李贽提出了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纲领，实际上，是开始对追求富足与和谐关系，提出了反省。明末清初，思想家陈确目睹当时人民缺衣少吃，

有的甚至饿死的凄惨情景，深感再反人欲不妥，提出了人欲恰到好处即天理的思想。王夫之的思想又有进展，认为圣人也有个人欲望，天理应该符合人欲，无人欲就没有天理。戴震则进一步提出，有欲才有为，无欲则无为。清代，尽管理学已失去生命力，但统治阶级还是把传统思想作为压制人民的手段。一直到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对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等传统价值取向开展了全面的批判。以上粗略的回顾，可以看出以求和谐的仁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在我国发展的大体脉络。可以这样认为，我国传统的价值追求，其特色是重和谐、重伦理、重义轻利、重理轻欲。表现在幸福观上是知足者常乐；在财富观上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穷光荣；在金钱观上为身外之物，万恶之源；在商业观上为无商不奸；在节俭观上为修身莫过于寡欲；在乡土观上为金窝银窝不如家乡的土窝；在经济道德观上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在门第观上为人微言轻，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功过观上为无过便是功，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在生死观上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生好的命，钉煞的秤，百般皆有命，半点不由人，命里只有八合半，跑遍天下不满升，命里穷来总是穷，拾着黄金要变铜；在人情观上为人情大如天，人情大于法；在知识观上为明人伦，通世故，闻道崇德；在国家荣辱观上为以礼义之邦自诩；在变革观上为利不十，不变法……以上多角度、多侧面的面面观，应该说，把我国传统价值追求，反映得淋漓尽致了。

1—5 关于价值追求的争论

价值追求，在群众中引起面红耳赤的争论，并不多见。然而，说它是文人雅士中最大笔墨官司之一，却不过分。

作为炎黄子孙，由于血肉与祖国相连，偏爱母亲之情是常常难免的。不带偏狭与偏执，需要勇气。尤其是质明流弊，往往是有负众望的。然而，偏辞莫益也是人之共识。

——作者



价值追求的争论波及世界，而且历久不衰。关于中国的价值追求，是争论的热点之一。反对，赞成，折衷，皆有人在。

早在五四时期，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如陈独秀等，是全盘性反传统价值的。他把我国儒学的传统价值，看成是一个统一的文化体系，认为不可能使儒学得到改造。陈独秀在《复辟与尊孔》中说到，要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的现代文化结合在一起，简直是不可能的。如果需要根本改革，唯一的抉择就是彻底摧毁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代之以西方的现代文化。即全盘接受西方价值追求。在陈独秀看来，儒学价值和实践的全部发展，都是由孔子思想所构成的原有整体的有机衍生物。历史上发生的不管什么变化都可以认为是传统本性的变异和分蘖。因此，除了全部抛弃外，别无它途。他在1917年3月1日的《新青年》上写道：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合两全之余地。吾人只得任取其一。他的思想特征是灯芯不能两头点，把中、西文化完全对立起来，把中、西的传统价值追求绝对化。

鲁迅也是五四时期文化界著名人物，他的意识特点呈现出一种深刻而未获解决的冲突。；在他的早期文章中，曾严厉批判了那些追随西方潮流而背叛中国传统价值的人。他认为中国要生存，必须进行改革。但这种改革不应全然抛弃中国传统和全盘西化，而是这两种文化要素的融合。到1918年《狂人日记》发表，鲁迅意识转变为整体地反传统价值，认为二千多年的文化史，翻开一看就是吃人两字。他还认为中医是巫术而不是科学。但是，他又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中某些成分是有意义的。于是，出现了他一面表现全盘性反传统价值的思想，另一

方面，却从知识和道德立场献身于一些中国的传统价值。

目前，持全盘反传统价值追求者，仍然不少。台湾学者柏杨就把中国传统文化比喻为发酵发臭的“酱缸文化”。比裔美神父司礼义，就直言不讳地表示对儒家价值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他说，在早期儒学中，偶然也曾灵光一闪，但后继无人，后来的儒学对中国社会是一点助益也没有。

与上相反，现代新儒学的先驱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提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尝到“人生的真味”，认为，中国传统的儒学价值才是人类理想境界的归宿。独创新唯识论哲学体系的熊十力，主张对西方的认识必须与中国价值系统的重建相辅而行，并应从本体论上加以努力。贺麟倡导新心学，认为，能否把西方价值儒化、华化、中国化，事关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的生死存亡。冯友兰提倡新理学，主张吸收西方哲学，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以形成新的价值体系。

港台现代新儒学代表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提出了现代新儒学返本开新的思想纲领，弘扬传统的中国价值系统，发表了轰动世界的文化宣言：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认为，中国以心性为一切价值的根源，比西方高明，孟子的民本思想与古代宰相制度，跟现代化民主建设不矛盾。只不过现代化对儒学提出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新外王，即发展科学和民主。内圣不变，外王更新。

成中英教授的见解，另有一番新意。认为：中国最基本的价值，来自《易经》哲学，它是生命哲学，经后现代化认识，可构成一套整体哲学，一种系统哲学。也变成信息论、控制论的思想。成中英认为，《易经》并不是某些人讲的朴素的辩证

法，而是高度复杂的辩证法。六十四卦，纵的变化，横的变化，从一到多的变化，从多到一的变化，一与多之间相辅相成的变化，是一个内容丰富的辩证体系，完全超过西方任何一个辩证法。因此，主张要以一个肯定自我的态度对西方进行再批判和再吸收。按成中英的观点，我们无须重起炉灶，完全可以利用传统《易经》哲学系统框架，批判地吸收西学，建设迷楼大厦。

以上简单涉览，可以使我们大体了解对中国传统价值的几种主要认识。如果再细分起来，在这百花园地中，还可以插上众多的分类牌。应该认为，上述各种理论，都有助于在不同侧面加深我们对中国传统价值追求的认识。全盘性反传统的，对传统价值追求弊端的尖锐批评，不可否定地推动了对传统价值追求的深刻反省；现代新儒学或《易经》本体哲学，对于我们研究保留中国传统价值的优势成份，无疑也有重要意义。

但是，应当指出，根据“表现学”原理，个体竞争与群体和谐是矛盾的自我同一结构，全盘西化或全盘反传统，新儒学以及东、西方价值取向的融同论都带有片面性。其实，全盘肯定或否定的思想本身，是中国传统思想方式的表现。说它好，可好到三十三天，说它差，可贬至十八层地狱，两者都是对矛盾自我同一的合理结构的破坏和歪曲。当然，矛盾自我同一体内的对立双方，也不是半斤八两，而是在不同条件下，有不同的优势子系统。一般而言，为了克服某种全局性的困难，就应该万众一心，集中统一，以群众和谐一致为优势子系统；在通常的情况下，则应该放开搞活，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以个体（部分）竞争为优势子系统。这里，可以对一与多的关系进行

多维动态分析，正确把握一与多之间的辩证关系和合理的结构。多维动态分析可用多维灰色模型 GM (1, N) 为基础，基本模型如下：

$$\begin{aligned}
 & (1 + 0.5a) X^{(0)}(K) + aX^{(1)}(K-1) \\
 & = b_2 X^{(1)}(K) + \dots + b_N X^{(1)}(K) \\
 & \frac{dX^{(1)}}{dt} + aX^{(1)} = b_2 X^{(1)}(K) + \dots + \\
 & \quad b_N X^{(1)}(K),
 \end{aligned}$$

这一 GM (1, N) 模型，常称为因素 $X_1, X_2, \dots, X_N$ 的动态协调模型并称 X 为后果因素或行为因素， $X_2, \dots, X_N$ 为作用因素， $a, b_2, \dots, b_N$ 为协调系数，其中 a 为自协调系数亦称为 $X^{(1)}$ 的发展系数， $b_i, i=2, \dots, N$ 为（互）协调系数。为了实现人生理想境界的价值，一般应进行因素协调分析，结构协调分析，数量关系协调分析，机制协调分析和模型协调分析（见邓聚龙，《多维灰色规划》，第103页—126页）。

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看，无论是西方传统的价值追求或东方传统的价值追求，虽然各有正面和负面，但都够不上是理想的价值追求。人生理想的两种价值桃子之间关系失调，结构失调，机制也失调。比如，中世纪前，西方的熊瞎子只有重视个人竞争的契机未能采到一个桃子；而中国却有一个求群体和谐的仁。中世纪以后，西方的熊瞎子开始搞到了一个价值桃子，求生存、求富足，即重视个人竞争创新；而中国，求和谐的仁，由于存在缺陷，受到批判，但新的求群体和谐价值并没有诞生，

重视个人竞争的价值也未能形成。五四运动以后，马列主义传入了中国，它既强调集体主义（即追求群体和谐），又指出了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前提才能达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但在实际执行上有偏差，结果是，有前者而缺少后者。由于与西方政治上的对立，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旗帜高举，科学的界定不得不服从了政治的需要。还令人遗憾的是，求群体和谐的桃子，后来由于把握不准，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霉变，把群体和谐的公平价值，误解成平均主义价值，结果是干好干坏一个样，反过来冲击了公平与和谐。这在本书以后章节还要深入探讨。

正如康德所说，也许自然的真理和人生的真理一样，从本质上都是深刻而简单的。那些复杂的研究对象所以显得复杂，可能是因为我们忘了深刻的东西一定是简单的，忘了科学和理性的目的正是去寻找纷乱表象后面的简单性。

当我们看清了底层的简单性以后，再由简到繁，剖析繁，往往又能加深对本质的理解。比如，从我国的传统价值看，其负面有：一、我国传统价值以伦理为本位，它会影响人对自然界的追求。拿荀子来说，他是唯物论者，他在《天论》里说：

“唯圣人不求知天。”到宋朝更加如此，认为搞自然科学的东西是雕虫小技，奇技淫巧。西方的人支配自然界的思想，决定了重视科学探索的价值取向，而我们的人与自然的片面和谐，恰恰抑止和限制了科学的进步。二、我国传统价值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占有主导地位的儒家精神，以仁为基本，特点是安分守己，灭除人欲，托古改制，保持既有，释经注义，不求创造。这种传统价值的沉积无疑是中华民族的一种消极的沉重负担，它是使我们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逐渐趋于落后的最重要原